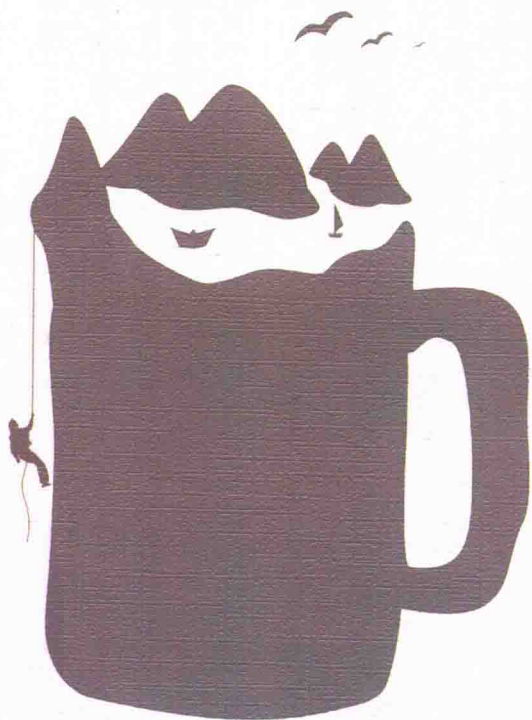


斯蒂芬·格林布莱特 文化诗学思想研究

陶永生 著

An Ideological Study of
Stephen Greenblatt's Cultural Poe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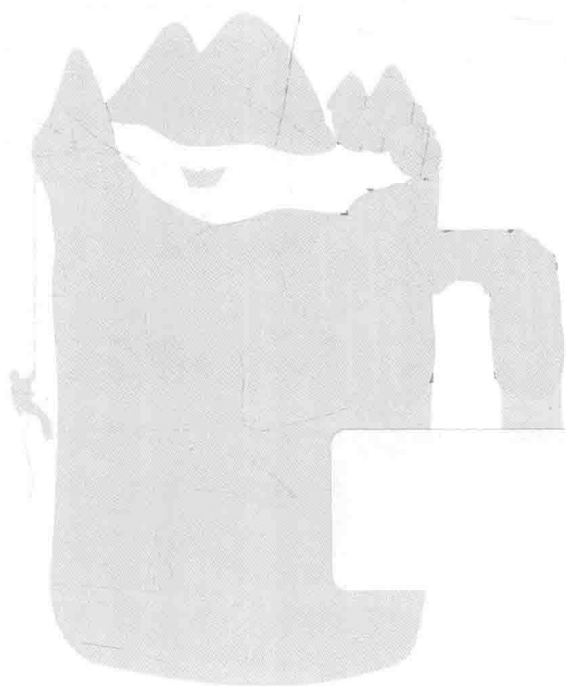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斯蒂芬·格林布莱特 文化诗学思想研究

陶永生 著

An Ideological Study of
Stephen Greenblatt's Cultural Poetic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斯蒂芬·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思想研究/陶永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 - 7 - 5203 - 2220 - 1

I. ①斯… II. ①陶… III. ①格林布莱特—诗学观—研究
IV. ①I712. 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278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7.5
字 数 332 千字
定 价 9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间性视域下美国新历史主义诠释观批判与反思研究”（批准号：15CWXJ41）的最终成果。

执 着

(序)

倓虚法师称“放下”为佛教本旨。然而，综观古今中外，凡有成就者，莫不“放不下”。不仅“放不下”，还“矢志不渝”“执迷不悟”。如果说“放下”是一种解脱烦恼、超尘拔俗的人生态度，那么，“执着”则是成就事业的通则。我不知永生兄是否能够在生活中放得下，却知他求学问道，执着非凡。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我以为，永生兄可谓一范例。

因缘际会，我与永生兄数年前相识。先是读过他的一些文学作品，继而也读了他的个别哲学、美学文章，其间，对他的人生经历也有了些许了解。

永生兄原本喜爱文学，对于更为抽象的哲学研究，则始于对事物深处之“所以然”的求知欲。据他自己说，初学哲学时，只是一人独自摸索，求索良苦，用功极多，但因驳杂无序，“术无专攻”而难以登堂入室。他也曾一度为此而苦恼与失落。但他凭着一种“精卫填海”般的执着劲头，咬紧牙关，一步一顿，奋力前行，终于转型成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回归了自己原初的身份。单从求学、求知的轨迹来看，他完结了“由博转约、由约入博”的首轮递进，由学士



时的汉语言文学科目，转徙硕士时的外国哲学，终复归了博士时的文艺学和博士后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追索永生兄的求知历程，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但有两点特别值得称道。一是执着不辍、持之以恒，这虽是事业成功的通则，但在永生兄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二是由博而约，既专又博的治学路径，即始于驳杂，逐步收缩视野，凝聚研究方向，聚拢在某个理论原点，掘进剔抉，继而又发散辐射开去，纵横开阖，建构出一个博大的系统。

案几上摆着的文稿清样是永生兄的第四部书稿。每部书稿都至少是“五年磨一剑”。该书是永生兄主持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斯蒂芬·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思想研究”的结项成果。论著以新历史主义视域中格林布莱特的文化诗学批评观为研究个案，结合格林布莱特的具象化批评实践活动，通过重点分析他的经典性论断和代表性论著，逐步演绎出其批评思想的来龙去脉和精髓要旨，目的在于从理论的源头上厘清与把握文化诗学批评观的学理思路和实践走向，揭示其“文化的主体性”与“主体性的文化”，“历史文本化”与“文本历史化”，“权力话语化”与“话语权力化”等多重互文批评范畴的文化品格、历史语境和政治内涵。与此同时，重估和重构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批评流派的发展脉络与理论框架，并开诚布公、实事求是地阐明其理论价值与历史局限，对中国文化诗学批评理论的当代阐释和主体重建无疑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启示价值和历史观映鉴意义。

该书力图比较系统地清点和研读以历史语境、文化塑造与政治解读为主轴的多种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著作和相关文本阐释典籍，从格林布莱特创立的新历史主义“新史学”观介入，在充分展示格林布



莱特文化诗学的“文化转向”复调景观的背景下，探究作为文化诗学批评核心理论的“文本阐释和意义生成”问题的诗性缘起、审美特质和本体论意义，阐发格氏文化诗学的诗性本真蕴含及文本阐释新动向，意在凸显格氏文化诗学批评思想与人类生活世界的密切关系，达成对人文精神科学的全新理解和把握，并给我们观照与评判当下人类的人文事象、人文事件及生存境遇提供另外一个“异在”视角与“他者”立场。

具体地说，作为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新历史主义或文化诗学的代表人物，斯蒂芬·格林布莱特的诗学思想与研究方法对西方和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有着重要的影响。该书以其为研究对象，选题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建设也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论著在认真搜集和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写成，对相关研究现状把握得比较全面。论著联系当今西方一些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对格林布莱特的文化诗学做了多方位的研究，比较清晰地揭示出了其内在的学术渊源与学术特色。论著对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的主要内容做了梳理、分析与逻辑建构，并在诸多问题上做出了自己的评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和一定的开拓性。在研究方法上，论著将历史意识与总体观念乃至政治文化结合起来，显示出研究方法的多元性。总体来说，论著视野开阔，结构清楚，内容充实，述评结合，体现出作者比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较强的科研潜力，语言表达也有自己的特色。论著对于格林布莱特的文化诗学思想的内在理论逻辑还可以进一步加以提炼，对于以格林布莱特为代表的文化诗学或新历史主义的局限还需要有一定的批评性理论反思。

时下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滚滚，物质主义盛行。在种种诱惑



面前，学界也变得浮躁不安。永生兄能够静心读书，专注于学术，且屡有新成果问世，实属难能可贵。欣闻该成果斩获山东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山东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多项殊荣。值新书出版之际，他恳切嘱我为之作序，却之不恭，只好勉为其难。回顾永生兄的求学历程，阅读他的书稿，不时为他的执着精神所感动，也为他取得优异成果而高兴。于是，写下了上面的话，权且为序吧。

傅有德

2016年7月16日

于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6
第二节 格林布莱特的学术经历	16
第三节 研究文献综述	23
第四节 本论著的逻辑线索和基本架构	40
第一章 文化诗学批评理论的学术渊源	44
第一节 文化诗学批评思想的多重来源	46
第二节 方法论视野下与格尔兹“文化人类学”的 同质异构性	54
第三节 新阐释学视域下与利科“文本占有论”的间性弥合	78
第四节 文本论视野下与詹姆逊“政治诗学”的内在互文性	98
第二章 史学维度的文化诗学批评形态	117
第一节 “新史学”维度	120
第二节 认识论层面的文化整体观	131
第三节 主体论指向的历史本源观	142



第四节 本体论向度的诗学意义观	150
第五节 实践论矢量的“文本无边界”说	164
 第三章 诗学维度的“文本阐释”观	174
第一节 “文本性与文学性”的双向调查	177
第二节 “比较视域”本体	181
第三节 碎片的“共鸣性”文本	189
第四节 “历史性与文化性”的文本间性	198
第五节 社会话语的“审美能量”观	204
 第四章 “自我塑型”论	216
第一节 “历史记忆”的文化塑造	219
第二节 “文化景观”的生活形塑与哲学表达	228
第三节 文化生产流通的“社会能量”转换论	238
第四节 “自我塑型”论的话语架构及阐释实践	246
第五节 “公共文化镜像”的自我塑型	260
 第五章 “意识形态批判”论	274
第一节 “文化解读”的“意义生成说”视域转换	277
第二节 语境化的“思辨的理解”作用力场	284
第三节 意识形态化的“凝视的理解”话语机制	291
第四节 权力结构的“隐喻性”表征形式	300
第五节 从“文本间性”理论到“主体间性”实践的 “旨趣”转换	312



第六章 批评实践的范式转换	326
第一节 以文学文本阐释为主轴的多元化批评范式	329
第二节 “情结”批评范式的“知识论转向”	337
第三节 形象诗学语境下的“共鸣”阐释	352
第四节 文学意义的“泛文化”阐释实践	365
结 语	383
第一节 当下文论生态面临的整体形势和共同任务	384
第二节 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的学术贡献与理论影响	390
第三节 “本土化”语境下文化诗学批评思潮的中国形态	397
参考文献	409
后 记	424

绪 论

粗线条勾勒一下中外文学批评理论形态的发展脉络，因为批评话语主体和批评客体对象的对应关系殊异，所以可以规划出两条文学批评路线：其一是批评主体先行、主导，而批评客体仅仅作被动的批评对象而存在的“主先客后”型或称“我注六经”式；其二是批评客体先行、主导，而批评主体要秉承忠诚于作品真实、历史真实的批评原则而言说的“客先主后”型或称“六经注我”式。这是两种立足点和出发点相向而行的文学批评观，分别为“情结主义”批评观和“情境主义”批评观。由此经由的两条运行轨迹及采信的两类批评范式，也就描述为“情结”文学批评范式和“情境”文学批评范式，它们各自所产生的批评效应也是截然相反的。诚如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在《新历史主义的理论盲区》一文中所指出的，历史阐释的真正困境还是在于左右为难的导向问题：“究竟应该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是忠于阐释对象的历史还是忠于阐释主体的‘我’的阐释？”^①

本论著秉持“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各美其美而又美美与

^① 王岳川：《新历史主义的理论盲区》，《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共的阐释理念，首先采信“情境”式文学批评方法，即批评主体主动“沉降”到文化事象和文学文本典籍中，从文本“原始痕迹”和作家的“客我”批评视角来还原和注解那些“共鸣性”的文化文本，进而用“厚描”式粗笔勾勒出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理论形态的来龙去脉和精髓要旨，外化表征为批评主体对作家和文本的本源认同和原创剔抉。接下来，改用“情结”式文学批评方法，“运用脑髓，放出眼光”，揭示其大胆跨越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疆界，将“文化解读与历史叙述”“政治话语与权力结构”和“文化世界与生活世界”等多重架构内在勾连起来，弥合无间地构塑成“想象的造型共同体”和“主客融合的文本联合体”的理论质素与实践特色。

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批评观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历史主义批评观和形式主义批评观的“新”的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话语和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范式，突出表现为一种对历史语境下的“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交互叠加的”文本联合体加以文化释义和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批评形态。针对文学批评形态的“批评主体”与“文本结构”二元批评格局和话语体系，不同形式的批评观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打出了各具特色而又主题鲜明的个性旗帜。形式主义批评观选择了“文本结构和形式语言”这样一组阐释关键词，传统历史主义批评观选择了“历史的客观决定”论。

而新历史主义批评观则选择了“批评主体与历史叙事”这样一组杂糅了主客视域的阐释策略。新历史主义批评观在对文本中心论和历史决定论的“扬弃”和“重塑”中，使“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这一组叙事策略重获关注并宠爱有加，也使“历史叙述与文化结构”“政治解读与文化诗学”这一对批评范畴成为当代文艺理



论研究的“新科”话题。

新历史主义批评学派大致诞生于20世纪后半叶的欧美文化界和文学艺术界。这一批评思潮首先在方法论领域取得突破,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已初露端倪,即在文艺复兴期的“英国伊丽莎白一世王朝断代史”研究领域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批评视角(critical perspective)和批评方法(critical method)。时移世易,这种刻意置身于历史语境中来阐释文学文本的“文化内涵与权力结构”的独特理论研究方法(theoretical research method)日益得到西方文论界的认可,一大批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也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其中,如雷贯耳者有斯蒂芬·格林布莱特(Stephen Greenblatt)、海登·怀特(Hyden White)、乔纳森·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路易·蒙特洛斯(Louis A. Montrose)等。初始是一种新构想(a different framework of Literary Theory),进而创生一种新理论形态,这一历史事件往往萌芽在社会急剧变革转型和学科重组变迁史上需要自我反思、自我修复、自我净化的历史时刻。新历史主义之“新”是相对于传统历史主义之“旧”和形式主义之“冷”而言说的。

加拿大文艺评论家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在《批评的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一书中,说过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文学位于人文学科的当中,它的一侧是历史,另一侧是哲学。由于文学本身不是一个系统的知识结构,于是批评家必须从历史学家的观念框架中去找事件,从哲学家的观念框架中去找思想。”^①诚哉斯言!首先从“知识论”角度来看,文学向来不追求文学自身知识的系统化、体系化,如果用那种整齐划一的科学方法论来

^① 盛宁:《历史·文本·意识形态——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刍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0期。



裁量文学的知识架构，可真称得上暴殄天物了。再次从历史文化维度来看，文学史的脉搏同时跃动着历史事件的“自我塑造”和哲学思辨的“历史记忆”。弗莱的这一论断可以说是新历史主义批评话语的首次发声，仿佛来自历史深处的遥远回响，虽然它还很稚嫩，又单薄微弱。

近代以来，历史主义批评学派的代表人物大都强调一种总体性的“本质主义”历史观，强调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是遵循一定的规律的，受到社会发展规律支配，所以他们作出如下承诺：历史主义将历史形态首要看作一种自我整体力量自主迸发和自由释放的思维形式，它想方设法为被看作一个整体的人类历史总方向提供一种阐释的理想模式和一整套“历史叙述”（historiography）。其中，这里暗含了整体论和决定论两个要点。这种“总体发展”的机械“本质主义”历史观，在20世纪初即遭遇了政治思想家和形式主义批评家的迎头痛击。

譬如说，英国政治思想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在《历史主义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中认为：历史整体论（或称决定论）存在着思想的盲点，“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人有权去作出自己的解释。历史虽然没有目的，但我们能把这些目的加在历史上面；历史虽然没有意义，但我们能给它一种意义”。^①波普尔对历史主义当头棒喝，并痛陈其累累罪行，诸如历史主义鼓吹的“集中的权力”极易做大而会消弭“个人的权力”，这种“封闭社会”的乌托邦工程极易导致集权主义。拨乱

^① [英] 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何林、赵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



而反正之，他倡扬的“开放社会”的“非中心”论、“非权威”论已被西方学术界普遍接受。

对传统历史主义批评学派发起攻城略地的另一组生力军是俄国形式主义等批评形态。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使文艺理论越出“历史”的雷池而跌入“形式”的渊薮。历经走马观花式的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潮起潮落，文艺批评实践在支离破碎的文字栈片中进行着一种“互文性”阐释实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是后结构主义批评学派的主轴概念，意指不同文学作品内蕴的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交互贯通、彼此渗透、相互交叉的联动关系。很快，这一概念便广为散播，成了跨界多栖明星。后来人们也用这个概念来界说不同文类的“子本”文本之间，甚至“母本”文本与政治境域、社会结构以及历史语境、批评主体之间的互渗、互参、互构关系。

当下流行的“跨学科的互文性视野”则主要是指跨越了常规意义上的学科疆界和认知规范，在本毫无交集的不同文类的各种文化文本之间搜寻求索内在的关联性与相通性。映射着“作家—作品—读者”三位一体式批评架构的中心位移和整体倾斜，盛极一时的“作家权威”“文本崇拜”等批评理念已成明日黄花，位列边缘、谪居边陲的批评家跃迁为文本阐释和意义理解的精神教父，“误读（misprision）和逆反（antithetic）成为现代阐释的独特锁钥”（布鲁姆语）。至此，历史意义、文化灵魂等传统理念和经典释义都在语言的解析和形式的分析中变成了意义的碎片。历史主义烟消云散，终于禅让于整个形式主义思潮。

在“新”历史主义披挂上阵之前，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等批评形态，已经将历史意识、历史批判、历史叙事等话



语模式作为自身文化阐释和审美分析的主要符码 (governing agenda)。正如撰写过大作《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研究与历史主题》(1986) 和《戏剧的目的》(1996) 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蒙特洛斯所说, “我们的分析和我们的理解, 必然是以我们自己特定的历史、社会和学术现状为出发点的; 我们所重构的历史 (histories), 都是我们这些作为历史的人的批评家所作的文本结构”^①。这种迥异于“旧”历史主义的历史文化研究思潮, 直接冲击着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语言操作和意义拼接, 使那蜗居冷宫的“何谓文学批评形态?” “文学批评与历史叙事的本质意义何在?” “文学批评史的功能何在?” 等本源性和根基性问题又获新宠, 迫使和协理人们在文化世界和生活世界的交汇点上, 找回了久违了的“精神伊甸园”, 进而面向新的历史意识和文化精神迈进了一大步。这无疑为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粉墨登场以至登峰造极”创设了逻辑前提和精神储备。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1980 年, 格林布莱特在《文类》(Genre) 学刊上发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型: 从莫尔到莎士比亚》(*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From More to Shakespeare*, 1980) 等系列论文, 首次将自己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改称作“文化诗学”(poetics of culture), “文化诗学的中心考虑的是防止自己永远在封闭的话语之间往来, 或者防止自

^① [美] 哈罗德·阿兰维瑟尔:《新历史主义》, 陈华生译, 罗特里奇公司 1989 年版, 第 15—36 页。